



在1977年高考的考场上 资料图片

# 一手怀抱儿子，一手演算『XYZ』

文 / 方鸿儒

1977年，我高考。记忆中并没有欣喜若狂，只觉得顺理成章，历史曾剥夺了属于我的权利，现在只是归还。

1977年，“我要高考”的意愿很强烈，因为能否离开北大荒，重回故乡上海，就在此一搏。

特殊年代特殊高考，时间极为紧迫，从报名到考试，满打满算不到两个月。要在这争分夺秒的时间段里，将十年荒废，十年遗忘悉数捡起，其难度可想而知。所谓的“教材”是匆匆从朋友处搜寻、借来的。“考纲”更是无从谈起，一切全凭当年在校时的功底。

1977年，我正当而立之年。那年儿子出生不久，我是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演算着“xyz”，与时间赛跑。

那年高考，因为十年积聚，应试者如云。初试考场设在团直学校。我至今仍记得，初试的数学题是监考老师抄写在黑板上的。等她抄完，我也几乎答完，且满分。初试的作文题是《当我填写报考志愿时……》。监考老师事后对我说：“你的作文写得像弹钢琴，跌宕起伏。”其实十年情感积压，能不一吐为快么？

一星期后，在团部商店的红墙上，张榜公布了“复试”名单。

复试已是1977年年底。复试考场设在师部中学。一天考两场，上下午各一场，共考四场——数学、语文、政治、史地（一卷）。

现在回想起来，在命运抉择的关头，我们这一代“特殊考生”临考前的心态其实很平静，亦很看开。

复试前一晚，师部宣传处为招待考生，特意在师部礼堂放映那个年代的“大片”——罗马尼亚影片《爆炸》。我们谁也没心思挑灯复习，而是去礼堂一睹为快。“高考”对我们来说，虽被注入了与命运搏击的不能承受之重，但我们同样可以从容笑对挑战！

复试完毕，师部用卡车把我们考生送到团部后，即各自回家。我是手持打狗棍，头顶朗月，足踏积雪，一步一坎，徒步二十余里，回到连队的家——“小草屋”时，妻子早已进入梦乡。

“录取通知书”则是在忐忑不安的企盼中由一位开拖拉机的哥们从团部邮局给我捎来的。我清楚记得：那天放学，我正从学校回家，他叫住了我，说有我的信。我拆开一看原来是“录取通知书”！刹那间，我心跳加剧，犹如怀揣着一块“通灵宝玉”——我的命根子，那种感觉此生仅有！

我成绩还算不错：数学117（我把理科生最后20分的附加题也做了），政治72，语文69，史地（一卷）81，录取的却是“大庆师范”。

1977年的高考，“家庭出身”仍是道难以跨越的坎，“择优录取”庶几还是一个“梦”。据传我们这批考生是被“服从分配”扩招进去的。

那年高考，正式入学已是1978年3月了。而我凭着还算不错的成绩当上了班级学习委员。

1977年，我高考，最感欣慰的是给了父亲一个交代、一份安慰。当我将“录取通知书”寄回家后，母亲来信说：“你父亲得知你被录取的喜讯后，病情顿时减轻了许多。”那一刻，我才掂出一纸“录取通知书”的分量，它胜过药石无数。

岁月如梦，转眼四十年过去。尽管1979年春，我为了“户口”放弃“文凭”，退学回沪，但我仍怀念和感激1977年的高考，因为它不仅给我一次证明自己人生价值的机会，更在于它重新开启了我们的民族智慧的闸门！



往事难忘

编者按：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得以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1977年的高考在冬天举行，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

本期，有三位本报读者，共同回忆起40年前的那次刻骨铭心的高考。

## 共同回忆 1977 年高考

1977年，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九团（绥滨农场）务农，全国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消息传来，我感到非常振奋。回想1968年16岁的我，满怀理想信念，在学校尚未分配时就报名与高一届的学生奔赴黑龙江，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战天斗地。1972年全国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从此，上大学成了我的宿愿。但几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现在国家恢复了高考，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说，只要努力机遇都是平等的。

农场传达全国恢复高考文件已是10月底，此时距初试只有十几天。我初中没毕业又中断学习数年，临阵仓促迎考，结果初试就名落孙山。

但我觉得政治的分数批低了，就与农场的上级机关——宝泉岭管理局教育部门联系，同意我前去查分。我乘了四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到了管理局，并背了一大摞马列等政治书籍，准备对“批错”处进行“理论”。局文卫处林存孟处长热情地接待了我，林处长当时五十岁左右，是转业军人，和蔼斯文，平易近人。他当即安排人员查了分数，告诉我分数没有批错，并解释查分数主要看各题小分有无加错，除非有十分明显的内容批错，才可报批更改。

回连队后，林处长又与我通了几次书信，对我求学的精神给予了积极的鼓励。

## 临考前晚我做了个梦

1977年的高考，我是那570万考生中的一员，更幸运的是我成了被录取的27万莘莘学子中的一个。

记得是国庆休假后回农场，才得到知识青年可以参加高考的通知。

从起初的震惊、不敢相信、到后来的欢呼雀跃、义无反顾地投身复习迎考，那些经历虽已模糊，但对于在国庆期间休假的后悔仍是清晰记得的。国庆假日用掉了8天的假期，眼看距高考时间2个月都不到，白白浪费了这么多的宝贵复习时间，多可惜呀。

我中学是74届的。中学四年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参加政治学习大批判，数理化的基础真的很差，而那些在校时发的课本根本不适合迎考用。唉，心里那个着急呀。于是四处找数理化书。有一本代数书是蓝色封面的，是一位在食堂工作的也要参加考试的同伴的宝贝。我就跟他商量，能否打个时间差，在他工作时（开饭的时间）借给我看，我们出工他休息时还给他。他的数学很好，每次还书时，我就顺便对对答案并请教几道难题。大概一周后，在上海医院工作的二姐总算托人带了几本数理化教科书给我。

因为正值秋收三抢时机，连队领导让我们顾全大局，遵守纪律。我就没有请假，在农场边工作边学习。

虽然那个年代在中学学的文化知识那么少，但好在我很喜欢读书，凡是中学课堂上曾经教过学过的，基本都能掌握。迎考时间有限，我决定放弃复习语文政治什么的，专攻尚未学过的数理化知识。一个说起来真正的初中知识都没掌握的学生，要“跳起来”参加大学入学考试，

难题真是太多了。

好在我们连队里，有一批志同道合奔考试的人，当时的连队支部书记也非常支持我们参加高考。我们组织了学习小组，那位特别爱好数学的战友担当了大家的数学老师。大家放工后或者是出工时偷偷地溜回来（班长放我们一码）在一起交流探讨，谁懂得多谁就多传授。那些各处搜罗来的考卷，成了我们模拟考试卷子。

好不容易争取到十天的假期。回上海后我就去找以前中学的同学，幸运的我又遇到一个邻居大阿哥是复旦化学系68届高材生，他无偿地花时间给我和78届应届生的小妹以及好友上化学课，他还告诉我，除了化学其他学科也可以问。那十天我没日没夜地恶补，像海绵那样吸收各种知识。正是偶遇的这些生命中的贵人，对我的高考命运起了重大的影响。

我们的考场安排在南门港。临考前晚我做了个梦，梦见我们新疏浚的河泛大水了。当时有点忐忑不知梦兆什么。后来才明白，那是水到渠成！

考试后那段的时间最难熬。当然，后来我们是笑着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得到消息的那一天晚上，收工后，我们连队的支部书记，在二楼的广播室里用他好听的男中音，兴奋地播报着我们连队的三份大学录取通知。76届的小女生是海运大学数学系，有数学天份的那位上了华师大生物系，我进了上海科技大学机械系。

1977年的高考，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程度的我，从此改变了生活轨迹。

龚钦华

## 我的两次高考经历

第二年，我开始为参加1978年的高考作准备。当时，我是连队副指导员兼团支部书记，组织参加报考的青年同志一起复习。没有地方，就在大食堂会场主席台上放几张桌子，白天干活，晚上复习。复习迎考难度相当大，一是原有的文化程度低；二是缺乏复习资料，仅靠家里寄来的几本旧书；三是没有专门老师辅导，更没有辅导班；四是复习时间不够，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好。1973年，我体检查出患有高血压，此时病况对工作、学习和生活都有影响，为此我曾请示农场组织科，能否回沪治疗一段时间，但未准假。

学习的困难和阻力不仅来自这些。虽然国家招生通知要求对报考者要积极支持和鼓励，但仍有一些人对恢复高考不理解，认为考大学是“不安心工作”、“不扎根边疆”，“晚上复习要影响白天工作”，这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阻力。我与报考的青年同志讨论了这个问题，要求一定做好本职工作，不要因复习迎考而影响工作。我一如既往地白天坚持奋战在田间地头，不在工作时间复习；晚上除了参加连队或组织团支部活动外，继续挑灯夜战，苦学苦读。

高考要进行体检，对我来说又

是一道难关。当时我因高血压已按政策申办病退，办理病退是因为血压不正常，而高考体检则要求血压正常，真是两难。我在高考体检血压偏高的情况下，通过治疗和调理，又经几次复查，最后一次幸好血压刚刚达标。

经过刻苦努力，1978年6月我顺利通过初试。7月，我完成了全国高考。

10月下旬，我盼来了录取通知——佳木斯师范专科学校。兴奋之余，我发现并未填过该校；同时获悉一个农场同学以相同的分数段考入了我填报过志愿的哈尔滨师范专科学校。因此，我试着向该校写了一封信，询问是否可以转校就读。很快教导处的王老师回了信，告知还有招生名额，可迅速与省招生办联系。我立即动身去哈尔滨，向省招生办提出了申请。回连队不久，就收到了哈尔滨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1978年12月16日，我终于踏上了赴哈尔滨求学之路，实现了当一名大学生的愿望。

宋爱国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母，关心父母的父母